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北京文化通讯

2013年第2、3期合刊
（总第10期）

本期要目

政策导览

■文化部发布《文化部“十二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施纲要》

■文化部发布《娱乐场所管理办法》

动态关注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正式命名颁牌

■社科院发布《2012—2013社会心态蓝皮书》

媒体聚焦

■《泰囧》：“三俗”的胜利?

■“屌丝”文化再引热议

尖峰观点

■许纪霖：中国如何走向文明的崛起

■《文汇报》访谈小约翰•柯布：美国的主流城市化模式正是中国所要避免的

海外视野

■法国影视基金如何“滚雪球”

■美英文化产业融资之道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Institute for Cultural Studies, Capital Normal University

1. 政策导览

(1)政策文件

■ 文化部发布《文化部“十二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施纲要》

2013 年 1 月 14 日，文化部发布《文化部“十二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实施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指出，在现阶段我国公共文化服务总体水平不高，与经济社会发展的进程和水平还不相适应，与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还不相适应，与底蕴深厚的文化资源大国地位还不相适应，与实现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任务还不相适应，突出表现在：文化事业费投入总量不足，公共文化设施不完善，队伍不够健全，资源缺乏统筹，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特别是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基础薄弱，公共文化服务和科技的融合度不高，公共文化管理体制改革还不够深入，管理和服务水平不高，政策落实不到位，政策法规体系不完善等。“十二五”时期，着力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良性运行和可持续发展势在必行。

本纲要坚持四大基本原则：1. 政府主导、坚持公益。牢牢把握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公益性质，充分发挥政府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以公共财政为支撑，以公益性文化单位为骨干，建立健全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深入实施文化惠民工程，加强立法、规划、监督和政策支持。2. 保障基本、促进公平。优先保障基本公共文化服务的供给，促进基本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3. 统筹城乡、突出基层。建立以城带乡联动机制，合理配置城乡公共文化资源，加强对农村和欠发达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帮扶力度，加大公共文化资源向城乡基层倾斜的力度。4. 创新机制、强化服务。创新发展思路和体制机制，着力解决制约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科学发展的突出矛盾和问题，努力提高公共文化服务效能。

《纲要》明确了“十二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具体目标，提出了“十二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国家基本标准和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二五”主要指标(见下表)：

表 1　“十二五”时期公共文化服务国家基本标准

服务项目	服务对象	保障标准	支出责任	覆盖水平
公共文化场馆开放	城乡居民	公共空间设施和基本服务项目免费，全年开放时间不少于 10 个月	中央和地方财政按比例共同负担	除文物建筑及遗址类博物馆外，各级文化文物部门归口管理的公共文化场馆全部向社会开放
公益性流动文化服务	城乡居民	免费享有文艺演出、图片展览、图书借阅等为一体的流动文化服务；每个乡镇每年送 4 场地方戏曲	地方政府负责，中央财政适当补助	基本建立灵活机动、方便群众的公益性流动文化服务网络，保障公益性演出场次

表 2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二五”主要指标

指标	单位	2010 年	2015 年
文化馆(群艺馆)达标率(部颁三级以上)	%	50	60
博物馆达标率(部颁三级以上)	%	16	23
图书馆达标率(部颁三级以上)	%	55. 8	60
每××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	万人/座	40	35
人均公共图书馆藏书量	册	0. 46	0. 7
文化馆(站)举办活动次数	万次	57	100
县级以上博物馆展览次数	万次	1	1. 5
公共图书馆总流通人次	亿人次	3. 28	4. 5
公共电子阅览室设置率	%	—	90
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资源量	TB	108	530
国家数字图书馆资源总量	TB	480	1000
文化馆(站)、博物馆、公共图书馆、美术馆等公共文化设施免费开放率	%	—	90
行政村文化活动场所设置率	%	34	90
(城市)社区文化活动场所设置率	%	46	90

《纲要》提出了“十二五”期间我国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的 10 大重点任务，其中包括：(一)继续提高基层公共文化设施建设水平，实现有效覆盖；(二)加强公共文化产品的创作和生产，丰富服务内容；(三)加强公共文化产品和服务供给，促进共建共享；(四)加强公共文化人才队伍建设，提升服务能力；(五)促进公共文化领域文化和科技融合发展，强化公共文化服务的技术支撑；(六)深入推进国家公共文化示范区(项目)创建工作；(七)加强制度设计，探索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长效机制；(八)加强对特

定地域、特定群体的公共文化服务，促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九)加强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十)探索完善文化志愿服务机制，广泛开展文化志愿服务活动。

《纲要》表明，“十二五”期间将完成532个地市级文化馆、博物馆、公共图书馆建设项目，其中，地市级文化馆221个，地市级博物馆122个，地市级公共图书馆189个；从2013年到2020年，每年选派1.9万名优秀文化工作者到“老少边”地区工作和提供服务，每年为“老少边”地区培训1500名急需紧缺的文化工作者；到2016年，计划建成国家公共文化示范区90个左右，示范项目180个左右，涵盖全国1/3的市县；“十二五”期间投入2250万元，主要用于图书馆、文化馆(站)等基层公益性文化单位制度创新、丰富服务内容、强化管理、提高队伍素质等方面。

（据文化部网站摘编，2013年1月14日）

■ 文化部发布《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十二五”规划纲要》

2013年1月30日，文化部发布《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十二五”规划纲要》(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提出的目标为：到2015年，文化共享工程数字资源总量达到530百万兆字节；服务网络实现从城市到农村的全面覆盖，公共电子阅览室基本覆盖全国所有乡镇和街道、社区，入户率达到50%。

《纲要》指出当下我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的主要任务为七个方面：(一)完善覆盖城乡的六级服务网络；(二)推进文化共享工程进入居民家庭；(三)实施“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四)加强数字资源建设的统筹规划和管理；(五)打造先进实用的技术支撑平台；(六)推动国家中长期人才培训计划的实施；(七)促进基层惠民服务品牌化专业化。

（据文化部网站摘编，2013年1月30日）

■ 文化部发布《娱乐场所管理办法》

2013年1月25日经文化部部务会议审议通过《娱乐场所管理办法》(以下简称《办法》)，该办法自2013年3月11日起正式施行。《办法》所针对的娱乐场所是指是指以营利为目的，向公众开放、消费者自娱自乐的歌舞、游艺等场所。歌舞娱乐场所是指提供伴奏音乐、歌曲点播服务或者提供舞蹈音乐、跳舞场地服务的经营场所；游艺娱乐场所是指通过游戏游艺设备提供游戏游艺服务的经营场所。《办法》指出，国家鼓励娱乐场所传播民族优秀文化艺术，提供面向大众的、健康有益的文化娱乐内容和服务；鼓励娱乐场所实行连锁化、品牌化经营。

《办法》规定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负责所在地娱乐场所经营活动的监管，负责娱乐场所提供的文化产品的内容监管，负责指导所在地娱乐场所行业协会工作。

根据《办法》，娱乐场所不得设立在以下地点：(一)房屋用途中含有住宅的建筑内；

(二)博物馆、图书馆和被核定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物内;(三)居民住宅区;(四)教育法规定的中小学校周围;(五)依照《医疗机构管理条例》及实施细则规定取得《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的医院周围;(六)各级中国共产党委员会及其所属各工作部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机关、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所属各工作部门、各级政治协商会议机关、各级人民法院、检察院机关、各级民主党派机关周围;(七)车站、机场等人群密集的场所;(八)建筑物地下一层以下(不含地下一层);(九)与危险化学品仓库毗连的区域。娱乐场所与学校、医院、机关距离及其测量方法由省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规定。

《办法》规定,设立娱乐场所,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有与其经营活动相适应的设施设备,提供的文化产品内容应当符合文化产品生产、出版、进口的规定;(二)歌舞娱乐场所消费者人均占有使用面积不得低于1.5平方米(农村地区除外),游艺娱乐场所的使用面积不少于200平方米,使用面积不包括办公、仓储等非营业性区域;(三)符合国家治安管理、消防安全、环境噪声等相关规定;(四)法律、法规和规章规定的其他条件。设立娱乐场所,应当向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设立中外合资经营、中外合作经营娱乐场所,应当向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省级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可以委托所在地县级以上文化主管部门进行实地检查。

歌舞娱乐场所经营应当符合以下规定:(一)播放、表演的节目不得含有文化主管部门核查禁止内容;(二)不得将场所使用的歌曲点播系统连接至境外曲库;(三)不得擅自变更场所使用的歌曲点播系统。违反(一)、(二)规定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的罚款。游艺娱乐场所经营应当符合以下规定:(一)不得设置未经文化主管部门内容核查的游戏游艺设备;(二)进行有奖经营活动的,奖品目录应当报所在地县级文化主管部门备案;(三)不得擅自变更游戏游艺设备;(四)实行游戏、游艺分区经营,并有明显的分区标志;(五)除国家法定节假日外,禁止未成年人进入游戏区。娱乐场所为未经文化主管部门批准的营业性演出活动提供场地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娱乐场所不配合文化主管部门的日常检查和技术监管措施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文化主管部门予以警告,并处5000元以上1万元以下罚款。

《办法》要求娱乐场所应当建立文化产品内容自审和巡查制度,确定专人负责管理在场所内提供的文化产品和服务。巡查情况应当记入营业日志。

(据文化部网站摘编,2013年2月4日)

■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

2013年2月2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纲要》提出了到2020年职工带薪年休假制度基本得到落实的发展目标。

为了落实这一目标,《纲要》提出了相应的一系列措施,主要有:(一)落实《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保障国民旅游休闲时间,鼓励机关、团体、企事业单位引导职工灵活

安排全年休假时间，完善针对民办非企业单位、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等单位的职工的休假保障措施。(二)稳定城市休闲公园等游览景区、景点门票价格，并逐步实行低票价。落实对未成年人、高校学生、教师、老年人、现役军人、残疾人等群体实行减免门票等优惠政策。鼓励设立公众免费开放日。(三)推进国民旅游休闲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公园绿地等公共休闲场所保护，对挤占公共旅游休闲资源的应限期整改。加快公共场所无障碍设施建设，逐步完善街区、景区等场所语音提示、盲文提示等无障碍信息服务。(四)加强国民旅游休闲产品开发与活动组织，积极开发新的旅游休闲形式，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大力发展红色旅游，提高红色旅游经典景区和精品线路的吸引力和影响力。

《纲要》要求把国民旅游休闲纳入各级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以及相关行业和部门的发展规划，加大政策扶持力度，逐步增加旅游休闲公共服务设施建设的资金投入。

（据中国政府网摘编，2013 年 2 月 18 日）

(2)政策解读

■ 国民休闲纲要发布，旅游业面临大好机遇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 年)》，纲要提出将对旅游休闲基础设施建设加大政策扶持力度，在业内人士看来，随着《纲要》的发布，旅游业也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中投顾问高级研究员薛胜文接受《证券日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带薪休假制度实行的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刺激旅游经济带动国民整体消费水平，利好酒店、餐饮、纪念品、商业等行业，预计能使旅游行业增收 500 亿左右。然而，受当前经济发展现状和企业体制的阻碍，带薪休假制度短期内难以实现，加快完善这一体制的配套措施是当务之急。

2012 年我国旅游业总收入约 2. 57 万亿元，同比增长 14%。而刚刚结束的蛇年春节旅游数据更是创下新高，2013 年春节黄金周期间，全国共接待游客 2. 03 亿人次，比上年春节黄金周增长 15. 1%；实现旅游收入 1170. 6 亿元，同比增长 15. 4%。这一串数据都在说明我国的旅游行业正在向着一个更快的速度发展。如今，国务院又发布了国民旅游休闲刚要，带薪休假制度的落实，让上班族出行旅游有了新的希望。中青旅控股董秘、证券部总经理王蕾认为，2013 – 2020 年，中国旅游市场将迎来繁荣时代。

（据中国经济网摘编，记者夏芳，2013 年 2 月 20 日）

■ 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直面城乡现实 跨越数字鸿沟

近年来，我国公共文化数字化进程日益加快，以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为代表的框架基本搭建完成，《中国文化报》对当前我国的公共文化数字化进程状况进行了解读。

在“数字文化社区”建设方面，以北京为例，“数字文化社区”工程是将现有的有线

电视线路引入街道社区文化站，依托高清交互平台，结合互联网无线技术，创建多媒体、跨平台、多终端的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平台，同时整合利用首都图书馆、艺术院团、文化共享工程等多渠道的文化信息资源，建立起融资讯查询、艺术欣赏、文化传播、交流互动为一体的公共文化数字新平台。通过这一平台，能传播300万册电子图书、1万余种电子期刊、2000种中华文化视频、1万种50万册古籍、2万场讲座以及专题视频等数字化文化信息资源。天津市保税区数字文化社区利用云平台，开发通过手机或iPad的终端享受数字文化资源的功能，用户只需注册申请一个账号，便能在网上“借阅”到想看的书籍或期刊，可以不必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

文章认为，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必须将数字化服务与社会现实相结合，面对在城市化进程中凸显出来的“空心化”与农民工市民化等问题，在文化建设中更应着重思考的是，农村文化建设如何提高农村的向心力？城市文化建设如何提高城市的包容力？认为加强数字化信息化建设，可以用现代科技手段促进信息的沟通、知识技能的提高、人际交往的便利，进而有效地减少城乡之间的差异，反对那种把城乡二元结构与城乡差异捆绑的观点。

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上要避免“数字鸿沟”加大的危险，当前各级政府大力加强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力图使硬件设施在不同地区和城乡之间普遍均衡，但是这种建设如果不注意提供简易的操作系统、提高使用者的技能，使数字化设施对弱势群体“能用”“好用”的话，反而会加剧“数字鸿沟”。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2012年7月发布的《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6月底，中国网民数量达到5.38亿，农村网民规模为1.46亿。该报告比较了历年来非网民不上网的原因，其中有两个原因的比例逐年上升。2012年，54.8%的非网民不上网的原因是因为“不懂电脑和网络”，相比2010年上升近10个百分点，IT技能的缺失依然是阻碍互联网深入普及的最大障碍，而因为没有上网设备而不上网的非网民比重在下降。因此公共文化数字化建设工作还需要政府和业界的介入和刺激，提高居民的电脑和上网操作技能，尤其要对不发达地区或低收入阶层制定特殊的扶持政策，加大对社会成员特别是弱势群体的数字化基本技能培训。

（据《中国文化报》摘编，记者徐玲，2013年2月27日）

■ 孔繁峙：名人故居保护认定今年即将出台草案

北京市政协委员、市文物局局长孔繁峙透露，名人故居保护认定办法的草案今年将出台，对于哪些是名人故居、该如何保护修缮等都将做出明确规定。值得关注的是，对于四合院、胡同的保护，将引入社会力量。

孔繁峙介绍，名人故居的保护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名人的标准，“哪些是名人，哪种程度是名人”；此外是由谁来认定名人，不同行业的名人该怎么评定。他认为，名人故居不是一个建筑概念，而是一个文化概念，即使特别破，即使名人是住在地洞里，

这个地洞也是名人的故居，“从这种程度上来说，莫言故居是有保护价值的”。此外，名人是否在故居出生、其产权是否属于名人、是借住还是常住，以及名人故居的保护、维修等，都要制定相关标准。孔繁峙说，作为文物部门，更希望历史建筑不要轻易动，也不要轻易改。

针对进今年的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孔繁峙说：“报告中在文物保护方面最大的亮点，就是对于四合院、胡同的保护有了一个新的思路——从原来政府单一保护转变为引入社会力量。”社会力量将可以得到其使用权，而在引入哪些资金、如何使用等方面，今后都将有详细标准。孔繁峙介绍，北京目前待修缮的四合院有 43 片，主要围绕故宫周边、景山周边、南北锣鼓巷、国子监街、雍和宫，以及西四、东四、一到八条等地区，面积近 20 平方公里，待疏解居民人数至少 40 万以上。完全依靠政府财政难以完成疏解腾退，所以“依靠社会力量参与名城保护、住户的腾退以及四合院的修缮、利用等，是报告提出的一个化解历史问题的办法，也是解决该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思路和探索。”引进社会资金后四合院的所有权不会变，社会力量出腾退资金后可得到使用权，可使用一定年数。孔繁峙同时强调，四合院、胡同的修缮绝不是引入资金以后就可随便开发和利用，出资的社会力量必须保护四合院和胡同，他们的使用不能危及文物安全。他表示四合院、胡同的维修一定要按照传统的建筑格局、形式，用传统的材料来做，并按照地区风貌来进行整体的修缮，今后将有详细的政策。

（据《京华时报》摘编，记者陈荞，2013 年 1 月 23 日）

2. 动态关注

■ 第二届文化产业商业模式高峰盛典在北京举行

2013 年 1 月 26 日，第二届文化产业商业模式高峰盛典在北京举行，本次论坛的主题为“文化产业商业模式的创新方向”。君联资本董事、总经理刘泽辉，浙江快克电视传媒有限公司首席战略官熊晓威，山水盛典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总裁黄兴，开心麻花创始人张晨，天创国际演艺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曹立民，北京市数虎创意科技有限公司总裁刘欣、方源资本董事徐慧等行业人士参加本次论坛。参与讨论的各位嘉宾从企业经营的角度总结各自对文化产业的认识，对于“文化企业商业模式塑造中需要哪些条件”这一问题，与会行业人士一致认为人才和资本对创新文化企业的商业模式来说是最重要的。

（据贸讯网摘编，记者任业海，2013 年 1 月 29 日）

■ 上海将建国家文化产业战略项目，欲造成文化特区

由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清华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中心、中国国际文化传播中心、中华文化促进会、“海立方文化创意城”专家委员会联合主办的国家文化产业战略项目“海立方文化艺术创意城”论证推介会，1 月 30 日上午在北京举行。

据介绍，“海立方”项目的建设目标是打造国家级文化体制改革及文化产业发展综合示范区，在先行先试和取得成功经验的基础上，再将“海立方”模式推向一个更具规模、且相对独立的行政区域，最终将这个特色区域建成中国文化特区。“海立方”作为国家级文化体制改革及文化产业发展综合示范区，将成为中国版权贸易自由港(中国版权交易中心)、中国艺术品交易市场、中国文化产品保税区、中国文化艺术展演和节会总部基地。

海立方集团董事局主席李新苗介绍，智慧经济将是“海立方”的基本定位和核心内容，通过高端化、国际化的产业集聚以及创意设计、研发孵化、版权交易、交流展示等核心功能打造一种全新资源，改变发展方式，推动产业转型，促进经济增长和解决劳动就业。

（据中国新闻网摘编，记者蒋雪林，2013 年 1 月 31 日）

■ 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正式命名颁牌

2013 年1 月16 日，由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办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命名暨颁牌仪式在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举行。

文化部副部长董伟、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王文章等为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传承人颁牌。这次命名和颁牌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基地”共 4 个，分别是苏州市苏绣艺术创新中心(张美芳)、南通蓝印花布艺术馆(吴元新)、禹州市苗家钧窑有限公司(苗长强)和福建省仙作古典工艺家具研究开发有限公司(林友华)。

（据人民网摘编，2013 年 1 月 16 日）

■ 社科院发布《2012—2013 社会心态蓝皮书》

2013 年1 月7 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2012—2013 社会心态蓝皮书》(以下简称《蓝皮书》)，在《蓝皮书》发布会议上，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副所长张翼对该蓝皮书予以解读说。

据介绍，《蓝皮书》对过去一年来中国社会民众的心理健康、生活满意度、安全感、社会公平感、社会支持、尊重和认同、社会信任和社会情绪等方面进行了研究，从总体上分析了目前社会心态的特点、发展态势和存在的问题。《蓝皮书》认为，社会情绪总体的基调是正向为主，但存在的一些不利于个人健康和社会和谐的负向情绪基调不容乐观。不断发生的社会性事件导致社会情绪的耐受性和控制点降低，社会事件的引爆点降低。仇恨、愤怒、怨恨、敌意等负向情绪与需求不满足、不信任、社会阶层分化有密切关系。一些本该同情却欣喜、本该愤恨却钦佩、本该谴责却赞美的“社会情绪反向”值得警惕。

针对目前社会心态中反映出的问题，《蓝皮书》提出一些政策建议，特别是要求关

注社会阶层意识，关注社会中低层认同群体的心态和处境，切实保障他们的权益。关注不同群体、身份、民族、阶层等的认同问题，研究化解群体矛盾、民族矛盾、阶层矛盾和身份地位矛盾的有效策略，避免群体和社会冲突的发生，避免社会的割裂。

（据中国经济网摘编，记者苏兰，2013 年 1 月 7 日）

3. 媒体聚焦

■《泰囧》：“三俗”的胜利?

编者按：电影《人再囧途之泰囧》（简称《泰囧》）在今年年初创造了中国电影历史上的一项又一项纪录，截止到下线最终累计票房 12.6 亿元人民币，影院观影人次突破 3900 万人，这被惊呼为“不可复制”的票房奇迹。对于这次票房的大胜利各方产生了激烈的意见冲突，对同一部电影的评价差别如此之大，这不能不令人深思。

华中师大文学院教授、作家晓苏在今年武汉市“两会”上炮轰电影《泰囧》对于文化产业产生不良示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他表示，《泰囧》这样没有审美价值与艺术含量的电影之所以能获得如此高的票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国民欣赏水平偏低，“票房越高，问题越大，这样的电影对于国民素质提高毫无意义，反倒会起到负面作用”。他认为《泰囧》在有意“作践”下层百姓，并宣扬拜金主义，所以不应当把《泰囧》当作成功的个案模仿学习，“文化产业最重要的使命，还是提高国民的文化素质与欣赏水平”。（据欧阳春艳：《大学教授炮轰〈泰囧〉：典型的“三俗”电影》，《长江日报》，2013 年 1 月 6 日）

“三俗论”马上就遭到了多方回击，有人认为一部普通娱乐片不能承载过重的文化担当任务，用一顶“‘文化担当’的大帽子去抹杀一部适合并适应‘普罗’大众的片子，除了有些‘上纲上线’之外，其实是不知所云。当下中国，《建国大业》那种高歌一曲时提振民心激荡士气的电影，我们需要；《一九四二》那种沉痛凝重时让我们反思的电影，我们也需要；《泰囧》这样在爆笑后可能引起幸福向往的电影，我们同样需要。这不仅是文化多元的需要，也是文化多元本身力量的表征。”（据刘火：《何必用“文化担当”痛贬〈泰囧〉》，《中国青年报》，2013 年 1 月 9 日）

更多的人是在反思《泰囧》的成功之道，“《泰囧》大热的背后，正是反映了观众压抑太久后渴望释放的心理。尤其是贺岁片，观众无非是需要一种‘含泪的笑’，一种能深入现实和内心深处的‘会心的笑’。反观今年贺岁档，几部大片在饥饿的深坑里挣扎，导致观众对于娱乐的渴求未被满足，于是一部《泰囧》释放了观众的热情。”（据宋冰：《〈泰囧〉火了 赢在什么?》，《人民日报（海外版）》，2013 年 1 月 7 日）更有激进观念，认为电影的成功是在于它成为“迷茫时代释放群体浮躁的精神出口”，“除了喜剧搞笑，剩下那点回归亲情的心灵启迪，完全沦为虚浮的外壳。但喜剧搞笑，对那些在权利、尊

严、公平、安全上遭受损害，却又无所适从的人们来说，足以充当最需要的精神麻醉剂。所有的人生，都是在路上，以公路喜剧片的既定模式反映中国人的现实生态，是个很好的表达框架。”(据单士兵：《火爆的〈泰囧〉：迷茫时代释放群体浮躁的精神出口》，《华西都市报》，2013 年 1 月 7 日) 在由北京市广播电影电视局组织召开的电影《人再囧途之泰囧》座谈会上，与会专家们的一个共同结论就是，《泰囧》赢在“接地气”，北京电影学院电影学系主任吴冠平认为，进行本土化改造是必须的，“要针对不同的受众阶层的文化、生活、现实处境，以及他们的社会地位，进行人物命运重新的梳理和编制。《泰囧》在这些方面提供了样板。”(据《专家谈〈泰囧〉成功的启示：要在心理上“接地气”》，光明网，2013 年 1 月 23 日) 有论者认为《泰囧》能够制造“向善引力”，是“温暖与善良”，成就了“电影的圆满”，“这是一个救赎与成长的故事，我们可以从中看到很多其它电影的影子，比如《遗愿清单》、《阿甘正传》、《在云端》，当然还有《人在囧途》。”(据邵岭：《〈泰囧〉：制造“向善引力”》，《文汇报》，2012 年 12 月 26 日)

北京市副市长鲁炜高度赞扬了《泰囧》的票房成就，“《泰囧》完全可以说是‘北京制造’，是北京文化产业的硕果，一部电影给北京赚十几亿。”在价值立场上，鲁炜对影片给予了正面评价，他还向参加北京市“两会”的代表推荐了本片，“没看推荐去看一下，贺岁片就应该吉祥、喜庆，让观众开心的笑嘛”。(据《贺岁片〈泰囧〉票房近 13 亿 价值取向获赞》，中国网，2013 年 1 月 24 日)

■ “神剧”重播引热议

编者按：春节假期期间《甄嬛传》、《新白娘子传奇》、《亮剑》、《还珠格格》等电视剧被各大电视台同时播出，由于这些电视剧重播次数太多，网友们称之为“神剧”。“神剧”的不断重播究竟是因为缺少艺术上的推陈出新还是因为经典能经久不衰，各大媒体有不同的看法。

文艺创新过于匮乏被多方认为是“神剧”不断重播的罪魁祸首，“当没有好的作品、好的剧本出炉时，当新出来的作品因过于浮躁而无法跟老作品相提并论时，那‘炒剩饭’自然会成为现实风景。”关于创新难的问题，有人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我们的电视剧审批制度。“可供选择的题材范围甚窄；另一方面，各种条条框框繁多。当条条框框甚多，自然会束缚创作者的思维、意识，一旦束缚增多，文艺的创新与繁荣，定然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你影响我，我影响你。”(据杨燕明：《“重播神剧”的根在哪？文艺创新太过匮乏》，《长江日报》，2012 年 2 月 20 日) 以抗战题材电视剧为例，2012 年，“横店影视城共接待剧组 150 个，其中 48 个剧组涉及抗战题材，约占 30%。然而欣欣向荣的表象下掩盖不了影视剧创作的低劣水平，模式化的‘英雄’和‘鬼子’单薄了人物，固化了思维，懒散了向上、向新的脚步。夸张的剧情毫无逻辑，揶揄历史的同时其实也在揶揄我们自己”。(据王丽美：《集体杀鬼子杀不出奥斯卡 学学李安的独创精神》，中

国网，2013 年 2 月 26 日)

另一方面，电视台愿意重播“神剧”也有着经济利益上的考虑，根据有关电视人介绍，电视台购买了电视剧二轮、三轮的播映权后，就可以在一段时间内不限次数地播放，每集的价格只要几千块，“电视台每天有大量的时间需要填充，新剧和自制节目显然是划不来的。经典电视剧重播有固定的观众群，价格实惠效果还好。”(据《神剧屡次重播成本低效果好》，《潇湘晨报》，2013 年 2 月 19 日)

但也有对这一现象持包容态度的，尽管目前国产电视剧创新能力偏低已是不争的事实，但是“电视剧重播热的背后，也有着‘存在即合理’的现实逻辑。很多精品剧重播时所取得的高收视率，足以代表一定观众群的心理需求和审美倾向”。并且，“美国的一项研究发现，经常重温自己喜爱的电视剧，有助于增强意志力和提高自控力，从而有益心理健康。且不论该成果的科学性，单说在当前快节奏、高压力的生活环境下，如果一部重播剧能将沉湎于网络的观众拉回电视前，重温往日时光、享受片刻轻松，又何乐而不为呢?”(据李浩燃：《“神剧”重播，有何不可》，《人民日报》，2013 年 2 月 20 日)

■ 热议“甄嬛”出口

编者按：今年年初，有消息说国产电视剧《甄嬛传》将会被美国公司改编引进，这使得全国的电视剧爱好者欢呼雀跃，中国的电视剧终于能够冲出亚太，进军大洋彼岸。但是在兴奋之余，业内人士也对于这种文化输出存有很多担忧。

根据《人民日报》提供的数据来看，从产量上来说，中国已经是全球电视剧生产第一大国，但是中国电视剧的口碑在国内外一向不如海外剧，根据国家广电总局的统计，“近几年来，中国电视剧海外销售量下降趋势明显，海外销售总额仅占全部销售总额的 5% 左右，且售价与美剧、日韩剧比相对低廉。国产剧数量是上来了，但就质量来看，其实还没有那么大规模。”好在国产剧越来越得到港台市场的青睐，而美国引进《甄嬛传》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该剧在国内的火爆收视率。《甄嬛传》制片人曹平则把成功归为电视剧精良的制作，“我们的拍摄质量完全符合美国电视台的播出要求。”她赞成导演郑晓龙把经费放在制作上的想法，剧组在服装、造型、化妆、道具上花了大量资金。(据张润芝：《国产电视剧走进“输出时代”》，《时代周刊》，219 期)

为何国产剧很难走出国门进军欧美市场，各方给出了不同的观点。《甄嬛传》的导演郑小龙强调的是价值观的接轨，他说：“我们文艺作品要想走出去，必须要反思我们的价值观是不是和国际接轨。我们是在精神层面、灵魂层面结构故事，还是简单生存层面？我们大部分片子还是在生存层面。”另一方面电视剧的制作模式不同也影响输出，“我们不了解国际规则。为什么韩国的电影能走出去，因为一批在美国学完电影的人回到韩国去，我们也必须要培养更多的留学生去学电影。”(据罗皓菱：《郑小龙：〈甄嬛传〉去美国是偶然　国剧难走向世界》，《中国青年报》，2013 年 2 月 7 日) 有人认为美国

电视剧市场发展得更加成熟并且竞争激烈，这也会导致外国电视剧难以进入美国市场。(据李婷：《“甄嬛”进军美国引网络狂欢 国产剧输出任重道远》，《文汇报》，2013 年 1 月 31 日)

《甄嬛传》此番要漂洋过海去往美国，各家对于其前景大多表示担忧，认为在输出和接受上会遭遇很多困难。首先“语言关”就是一大难题，台词该怎么翻译才能让老外体会到“愿得一心人，白首不分离”的妙处？“想必也是极好的”、“贱人就是矫情”、“赏你一丈红”这些引发中国网友共鸣无数的“金句”，如何才能与外国观众共享？(据南方：《“甄嬛”赴美要过三道坎：贱人就是矫情怎么译》，《青岛日报》，2013 年 2 月 6 日)其次，引进方的改编删减会降低观赏性，辽宁省电视家协会的马琳说“《甄嬛传》只能删减，但这样大幅度的删减，人物关系能否看明白是个问题。假如把剧中推动情节发展的医药、饮食等中国文化元素都删掉了，光剩下宫斗，这部剧就没什么看头了。”(杨竞：《“甄嬛”出国被忧水土不服 大幅删减只剩宫斗》，辽宁日报，2013 年 2 月 20 日)最重要的还是价值观问题，有激进观点认为，“《甄嬛传》在美国社会至多会引起亚裔一代移民的关注。至于那些深受西方价值观影响的美国人，并不能接受这种落后价值观的输出，因为他们既达不到文化共鸣，也没有动力去学习戏中的计谋。”(据侯健羽：《〈甄嬛传〉能输出什么价值观?》，《南方都市报》，2013 年 2 月 24 日)

■ “屌丝”文化再引热议

编者按：近日，网络出现了一则“2013 屌丝标准”，其中包括“男屌丝标准”10 条和“女屌丝标准”9 条，“标准”一出立即引来了媒体广泛的关注。这一并不十分新鲜的网络词语又一次成为社会议论的焦点。为何该词能够一再挑动国人的神经？为何如此多的人会争相“做屌丝”？在它背后能反映出什么样的社会心态？这些问题都发人深省。

新出炉的这份“2013 屌丝标准”可谓覆盖广、划分细，男屌丝的衡量标准不仅包括饮酒类型、随身携带现金数量、抽烟的品质、年终奖的多少，甚至还包括婚前交过女友的数量，而衡量是否是一个女屌丝的标准也包括“没穿过比基尼，没有亮色指甲油，不会穿成套的内衣裤，从不穿 5 厘米以上的高跟鞋，超半年没有换过发型”等。“屌丝”，是中国大陆地区网络文化兴盛后产生的讽刺和自嘲用语，开始通常用作称呼“穷矮丑”(与“高富帅”相对)的人。其中“屌丝”最显著的特征是穷，房子、车子对于屌丝来说是遥不可及的梦。2012 年初，“屌丝”被用于百度雷霆三巨头吧对李毅吧会员的爱称，从此在中国大陆地区广泛流行起来，在年轻人群体间的语言文化中更被广泛应用。2012 年 11 月 3 日，屌丝一词更是登上了《人民日报》十八大特刊，引发了又一轮的热议，似乎官方也开始承认被称作“屌丝”的这一群体的社会存在，并且把其与“拼爹时代”、“极端事件”、“群体性事件”等词汇并列，成为当下中国社会结构变化缩影的一部分。(据朱星光：《乐观，才是屌丝的判断标准》，中国网，2013 年 2 月 24 日)

令人感到奇怪的是，屌丝这个原本指向明确的词汇，因为意蕴的不断丰富，许多和“穷矮丑”毫无联系，甚至还是“高富帅”，与“屌丝”八竿子都打不到一块儿的人，却仍乐此不疲地“对号入座”，把屌丝这个名号安放在自己身上，他们有的干着体面的工作，有的家里有漂亮温柔“女神级”的老婆……作家兼赛车手韩寒说，我是纯正的上海郊区农村“屌丝”；人气乐团“五月天”说，走下舞台我们就是“屌丝”；球星李毅大帝也从一开始被人称作屌丝的愤怒渐渐变成了乐于接受这一称呼。也许是为了避免或者杜绝这种“伪”屌丝的出现，“净化”屌丝队伍，所以才有了一份“2013 屌丝标准”。(据朱星光：《乐观，才是屌丝的判断标准》，中国网，2013 年 2 月 24 日)

对于这种现象，著名导演冯小刚表示出相当的激愤的情绪，他在个人微博上说：“称自己是草根是自嘲；称自己是屌丝那是自贱。分属两个不同群体：一个是弱势群体，一个是脑残群体。看评论，一些人恍然大悟糊涂上了流行的当；一些人执迷不悟坚持认为屌丝这词不寒碜跟镀了金似的，这谁也拦不住，您惠存。”自称“屌丝”在他看来就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据《冯小刚：“屌丝”是自贱 中国人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凤凰网，2013 年 2 月 27 日)仅从字面意思上来看待“屌丝”，它必然免不了受人批判：“如今新男女标准确实太‘屌’了，它‘屌’了的不是标准，而是文明，让文明伤不起，让我们的一些行为规范，及其更多的标准都哗众取宠，或者说是败坏了风气，伤了文明，或者说是道德观念……既凝聚不了正能量，而且也传递出的是庸俗，传递出的是一种低俗文化，这样的标准不要也罢，远离我们，远离我们的生活，让文明标准推动社会，带动我们，凝聚力量。”(据白东河：《“屌”男女标准屌了的不是标准是文明》，千龙网，2013 年 2 月 25 日)还有论者认为，就算这个词在当下不会被视为有伤风化，但自动对号入座起码是一种“自我矮化”，“屌丝，从诞生的那天起就更侧重一种心态，不是人们真正的生存状态，这些自称屌丝的人，可能生活滋润，即使开着二手车，也能进出西餐店、KTV。而真正处于社会底层的人，可能根本就不知“屌丝”为何物，更不会自称屌丝。自称屌丝，是自嘲，只不过这种自嘲同以往有些不同，人们先设定一个‘高富帅’的标准，再用这个标准矮化、打压自己。”这种心态是不健康的。(据龙小梅：《别用“屌丝标准”矮化普通人的生活》，北方网，2013 年 2 月 25 日)

但是也有人对于这种现象表示宽容理解甚至赞许，“其实，纵然‘屌丝’一词没有任何‘低劣出身’，也没有谁愿意以‘屌丝’自居。哪个人不想成为高富帅呢? 可是，当逼仄现实呈现于眼前，累得气喘吁吁，当拼爹左右着生活的前景，命运很多时候难以为个人掌控，自嘲，则是无能为力的人们最好的安抚心境的办法，如此，又怎么忍心苛求用词的准确与否?”(据里工：《给大家自称屌丝的权力》，《北京晨报》，2013 年 2 月 28 日)“屌丝是一个身份，屌丝心态是一种思维方式。从这个词汇出现伊始，就呈现出一种自嘲倾向和意味，后来意蕴丰富演变的过程也证明了这一点。而自嘲，是最高级的幽默——反映了艰难境遇与强大压力下的乐观。可见，自诩为屌丝的那一群人，不论是‘纯’屌丝还是‘伪’屌丝，他们的共同核心特质都应该指向的是乐观。”(据朱星光：《乐

观，才是屌丝的判断标准》，中国网，2013 年 2 月 24 日)

“屌丝”和“屌丝文化”已经客观地存在于我们的社会中，反对，或否认，都无济于事，反而恰恰让我们在反对或否认声中读出了别样的意思。“屌丝”的产生及流行，虽然是情绪化的产物，但也是客观现实的产物；虽然是主流社会不愿意看到的文化现象，但绝不是无厘头的产物。对“屌丝”标准和定义的争论，折射出的是一个社会失序给底层青年带来的集体性心理创伤。因为现实中阶层利益固化现象越来越严重，底层青年再怎么努力也基本无法实现层级的转换，在前进和“钱”进的道路上充满泥泞和荆棘，即使不是处处碰壁，至少也难以保持健康的乐观心态。“屌丝”的产生及流行，就是现实的折射，就是对现实的不满和宣泄，但更是对现实的无奈。“屌丝”的警示意义或许就在于此。(据冀北仁：《“屌丝”的流行与警示》，《西安晚报》，2013 年 3 月 11 日)

4. 尖峰观点

■ 胡疆锋：当代官场小说的权力伦理

作者在该论文中指出，中国官场小说非当代特有。从唐传奇、《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到晚清谴责小说、民国讽刺小说，再到建国后的干预生活小说、新时期的改革小说、新写实主义小说，官场小说已有一千多年的历史。当代官场小说有许多名字：“反腐小说”、“官场生态小说”、“政治小说”、“现实主义小说”。但无论叫什么，其焦点无疑是各种权力场。这里所说的权力，主要指公共权力或公职权，是由少数人代表公共利益来掌握公共财富分配的制度安排。

中国当代官场小说重在揭示权力的运作内幕，尤其是权力分配和治理的谋略、权力腐败(权钱色的交易)和滥用的细节、领导批示的奥妙、权力平衡的建立等，勾勒出官场的倾轧、载刺、拔桩、篡夺、猜忌、弹劾、笼络、设套、洗牌、控制等权力斗争，构筑起一幅“现代官场生态全景图”。

当代官场小说对主导文化的人民伦理日趋冷淡，或避开塑造正面形象，或用反讽的手法对进行解构，对新兴文化的精英伦理也少有触及，对残余文化的实用主义伦理却是兴趣盎然。大多数当代官场小说没有建构出一种价值观的张力，而是显示出对实用主义伦理隐隐约约的认同，有意无意地膜拜权力，主张腐败必然论，为权力腐败和滥用辩护，推导出一套人性归罪的逻辑，过多地推崇权谋文化，这对于官场小说的发展、文化大繁荣乃至中国的政治文明建设都是无益的。

权力膜拜论和腐败必然论的背后都藏着一个推论：追求权力是人的本性，权力是恶的，因此“当官必贪，有权必腐”，“天下乌鸦一般黑”。这让我们想起两个著名的论断：一个是英国学者阿克顿所说的：“权力倾向于腐败，绝对的权力倾向于绝对的腐败。”另一个是法 国思想家孟德斯鸠说的：“一条永恒的经验是：任何掌权者都倾向于滥用权力；他会一直如此行事，直到受到限制。”这两句话都指出权力有恶的因素，但如果从权

力的本质上看，作为一种工具，权力是中性的，本身没有恶与不恶的问题。权力可以奴役他人，也可以解放他人。绝对的权力倾向于腐败，但相对的权力则给社会带 来好处。权力是福还是祸，关键在于如何去使用它，权力治理的核心是如何对权力运行进行有效的制度管理，使它按照授权者的愿望规范地进行。权力腐败的本源不 是人性的恶，而是由于权力制度的设计和运行存在缺陷和问题。官场小说对权力的本质和权力制度应该有更开放的思考，而不能仅仅停留在权力膜拜论和腐败合理论 的层面上。

同样，官场小说细致入微、过于繁密的 权谋叙事也导致了读者对权谋文化产生了某种认可，很容易将它当作官场的升职宝典和教科书，官场小说也难免产生“诲官”的效果。在热衷权谋叙事的小说中，读 者很难因权力失去制约与监督而产生警惕，很难以感受到建设现代政治文明的迫切性，也很难提高现代公民意识(如权利意识和法治意识)。这大概也是注重权谋描写的当代官场小说的通病。

(据《文艺研究》摘编，2012 年第 4 期)

■ 李云雷：从谴责小说到实用主义的宝典

作者先后观察了当前官场小说与改革文学、17 年文学和晚清谴责小说的关系。认为，在 10 年的视野中，“官场小说”内部有一个从“现实主义”到“实用主义”的变化；在 30 年的视野中，从“改革文学”到“官场小说”，有一个从“思想斗争”到“权力斗争”的变化；在 60 年的视野中，“十七年文学”开创了“思想斗争”的模式，在“斗争”中更具理想性、人民性与纯洁性；在 100 年的视野中，“官场小说”与晚清的“谴责小说”最为相似，但其最大的不同在于对现实秩序的态度已由“谴责”变为“认同”。

在十多年前，王跃文、阎真的小说中，“官场”是一个巨大的“异化”力量，作者对这一场域充满了怀疑，主人公融入其中也是不得已的被迫适应，对其险恶有着清醒的意识，在作品的总体倾向中也有着批判的意识，至少也在质疑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合法性，叙述者通过对主人公经历的叙述，重点揭示的是置身其中的人的生存境遇。而在《二号首长》(2011)、《侯卫东官场笔记》(2010)、《省委班子》(2010)等近几年出现的作品中，我们看到的“官场”已经是一个不容置疑的巨大存在，在它的运行逻辑中，个人的生存境遇已经并不重要，在这里，“权力”自身已经获得了合法性，成为小说关注的“主题”，权力斗争以及围绕权力的获得、转移、交换、分配的故事，及其规则与“潜规则”，成为小说的主要内容。“权力”可以说是这类作品唯一的“主角”，它超越了意识形态与道德伦理的限制，构成了主人公人生价值的终极评判，也构造了当代社会的等级秩序与整体结构。如果说王跃文、阎真的小说是“现实主义”的作品，那么《二号首长》、《侯卫东官场笔记》等作品可以说是“实用主义”的作品。“现实主义”作品具有批判与反思的意味，而“实用主义”的作品对官场规则并无褒贬，只是“客观”地呈现，同时注重总结官场上的经验教训，让读者可以“实用性”地学习与操作。

与八十年代兴盛的“改革文学”比照，在当下的“官场小说”中，权力斗争构成了小

说中最为核心的因素，虽然斗争的双方也存在思想、观念上的不同，但这一因素在小说中并不占据主要的位置，而是可有可无的。权力以及在权力阶梯中获得更高的位置，成为此类小说主人公最高的价值认同。并且，在“改革文学”中我们可以看到光彩四射的正面人物，而在“官场小说”中却几乎看不到正面的人物形象。

与清末兴起的“谴责小说”对比，“官场小说”中虽然也揭示了官场的内幕与运作机制，但却很少有“谴责”或批判的态度，这些作品一方面以“客观”的态度呈现这些内幕，另一方面不断总结官场的经验与得失，使之成为一种实用性的手册，在总体上持一种认同的态度。

总之，当前的官场小说失掉了批判精神，更多具有实用主义的指导意味。它的最大价值就在于，让那些隐秘的“政治无意识”显影，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时代精神症候的镜像。这个镜中之像呈现的是一个“权力斗争”的世界，是由重重叠叠的权力关系构成的网络，只要进入其内在逻辑与机制，便很难挣脱出来，仿佛鲁迅笔下“万难毁坏的铁屋子”。

（据《文化纵横》摘编，2012 年第 6 期）

■ 唐昊：体制夹缝中的年轻人

当下中国青年毕业后的一大梦想就是进入“体制”，体制的吸引力已经越出国门，就连“海归”也越来越多地把进入体制作为第一选择。处于人生最有活力、最强调自主性、最愿意冒险的阶段，青年们竞相选择安稳、体面、高福利的体制内单位作为其事业起点，不外两个原因，一是体制外给他们提供的空间过少，体制外的环境也在逐渐变差；二是中国的青年受原有体制驯化的程度较为严重。

为何“体制内”与“体制外”之间有如此大的差别，作者认为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在中国当前的政治实践中，许多制度性安排(即“体制”)有时并未带来平等，而是使人群分化，通常会造成社会成员中部分人获利和另外一部分人受损。在现有体制中长期获利的社会成员属于体制内，其他领域的社会成员则属于体制外。二者的利益差别是巨大的：体制内的人群不但享有更加安稳、体面、更受制度保障的生活，而且其所在的机构往往握有更大的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政府机关、垄断企业等)；相对来说体制外的人群更难保障自己的基本权利和利益(中小企业主、农民工等)，更容易受到来自权力的侵害。并且体制的“内”“外”之分，在很大程度上是以意识形态划界的。

中国的青年受原有体制驯化的程度为何较为严重？作者认为，在中国对体制内的规则和“潜规则”的认同正逐渐演化为一种文化锁定，对体制的认同渗透进了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成为国民人格的一部分。但这种认同不是对体制内涵的认同，而是认定无法改变体制的无奈服从。在某种程度上，中国的“体制”不但剥夺了年轻人的机会、能力，更重要的是消解了年轻人的梦想，改变了年轻人的本性，使其更关注个人利益，也更能容忍社会不公。就主观方面来说，青年之所以那么容易被体制驯化，在很大程度上是其

自身内涵和自主信念的缺乏。而又正是因为中国青年缺乏参与公共生活的经验，才被剥夺了在公共生活中形成和巩固自我价值观的机会，才可能被体制轻易改变。

在中国，社会结构和体制之间的不断互动和相互加持，导致了体制的固化和强大，并成为社会成员依赖的对象。但体制并不一定是年轻人的敌人，而更应是他们倚重但必须要改变的对象。中国的背景环境正在发生变化，一方面新生的社会问题已经成为原有体制难以解决(比如日益严重的大学生就业难问题)，另一方面改变体制的力量正在空前地成长起来。体制变化的速度总是低于社会变化的速度，也低于青年觉醒和崛起的速度。在被剥夺了更多发展机会的市场和社会领域，我们仍然能够发现来自青年的鲜活力量在生长。近年来，轰轰烈烈的城市环境社会运动、公民慈善运动、公益创新活动的主体都是青年，说明属于青年人的理想主义冲动始终是无法磨灭的。在这个意义上，年轻人没有被体制驯化，年轻的生命也永远不可能被驯化，他们的使命终归是改变世界。

（据《文化纵横》摘编，2012 年第 6 期）

■ 许纪霖：中国如何走向文明的崛起

许纪霖认为在“中国崛起”的呼声日益高涨的时候，我们需要进行冷静反思。首先一个问题，我们是要文明的崛起，还是富强的崛起？“富强的崛起”只是以 GDP 为核心的一组统计数据，所谓民富国强，是综合国力的展现；而“文明的崛起”则是一种普世价值与制度体系，是人类历史演化中新的生存方式和意义系统的诞生。富强与文明是近代西方崛起的两大秘密，中国在追求现代化过程当中，暂时舍弃了文明，全副精力攻富强，不惜一切代价学西方，追求“富强的崛起”。如今，在富强这张脸谱上，中国已经步入“现代”，而“现代”的代价却是“中国”的失落——不是国家主权意义上、而是文明主体意义上的中国。而一个可欲的现代性既包含物质文明(富强)，也内涵精神文明(价值)，一个真正崛起的中国不应该沦为西方精神的俘虏，堕于腐败、冷酷与野蛮。

现代性可以说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是物质和科技的进步登峰造极，另一面却是野蛮的空前。如何对抗这种内在的“野蛮性”？许纪霖认为，自由、民主、法治、平等各种价值以及相应的社会政治建制，还有人类几千年的人文与宗教传统，都是制约现代性负面的有效因素。

现代中国的重建，不应满足于民族国家的建构，还要恢复文明国家的风采，唯有文明大国，拥有话语领导权或文明竞争力的大国，才有可能得到全世界的尊重。民族国家是个别的，它只有特殊性的文化，而文明国家是普世的，无论它用什么样的力(军事力、金融力或经济力)领导世界，在实力背后还要有普世性的文明。文明与文化不同，文明关心的是“什么是好的”，而文化关注的则是“什么是我们的”。文化只是为了将“我们”与“他者”区别开来，实现对“我们”的认同；文明要从超越的视野——或者是自然、或者是上帝，或者是普遍的历史——回答“什么是好的”，这个“好”不仅对“我们”是好的，而且对“他们”也同样是好的，是全人类普遍之好。所以，我们不能单纯地“中国的”价

值代替“好的”价值，封闭的“区别敌我论”并不能构成有效的价值正当性，“中国特殊论”貌似政治正确，却将文明降低到文化的层次，大大矮化了中国文明，实非中国之福音。但中国文化毕竟是伟大的轴心文明，特殊之中蕴涵着丰富的普遍性，蕴涵着可以与人类其他文化分享的普世文明。

中国走向“文明的崛起”过程中的一大屏障是马基雅维利式的国家主义，支配它的国家理性认为，国家一旦获得了自主性，具有了最高主权的形式，便不再有外在的道德规范，其内在的权势如同恶魔一样便自我繁殖，向外扩张。假如国家理性缺乏启蒙理性的导航和制约，任其自身发展，将会把民族拖下无底的深渊。所以我们要时刻警惕国家理性借文明的名义扩张其权势，并切实为国家建构奠定一个普世性的文明基础。

（据许纪霖主编：《知识分子论丛》第 10 辑“何种文明？中国崛起的再思考”摘编，2013 年 2 月 21 日）

■《文汇报》访谈小约翰·柯布：美国的主流城市化模式正是中国所要避免的

美国中美后现代发展研究院院长、著名生态经济学家小约翰·柯布近日接受了《文汇报》的专访，他认为全球生态系统面临的一个可能成为现实的主要威胁在于，青藏高原的冰川有可能在不到 50 年后融化，而印度河、恒河和湄公河，长江和黄河都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这些冰川。要应对这种可能的灾难，人类必须要改变对美好生活的定义或理解。世界各地的人们一直相信美好的生活就是奢侈的生活。“美好生活”的标准是由消费的多少来决定的；国家的发展则是依据产量的增加来评判的。只要这一观念依然占据主导地位，我们的领导人就得被迫采取那些将会导致我们星球一步步走向灭亡的政策。提高效率和减少浪费是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另外，很多问题也可以通过科技手段来解决。但是，只要我们不改变这种错误观念，保护生态发展所必要的深层变化是不可能发生的。他认为目前还没有任何一个主要国家的政府高度重视真正的生态发展，在推进生态环境保护这方面，中国完全可以给世界做出表率。

针对美国目前的政策，他表示不断出口优质资源和不断进口过多产品，是难以为继、不可持续的。所以不能支持美国现在的这些全球化策略，因为其所仰赖的经济基础已行将崩溃。当年的英国放弃维持帝国地位的努力，意味着英国不再试图控制全球，而是转向为本国公民提供良好生活这一方向。应该说，这样的转向是最有利于降低生态危机风险的。虽然像美国那样去竞争全球范围的主导权，对中国来说是极具诱惑力的，但是，中国事实上应该扮演一个更为恰当的角色——作为第三世界的领导者，为世界的利益而奋斗。对中国来说，这就意味着不再像美国那样成为剥削第三世界的殖民势力，而是集中力量以自身资源为主，推进可持续发展。

对于城市化问题，在柯布看来，城乡差别可以通过政府制定的公共政策来缩小。一个健全的社会，农业生产者应该享有与城市工人同等的经济利益——他们的工作实际上更为重要，应该得到起码的同等待遇。即使是城市化，也要考虑到城市自身的魅力问题。更好的医疗条件、教育服务和文化环境，都是形成城市魅力的非常重要的因素。从

可持续性原则出发，他倾向于中国中小型城市与后现代农业要并举发展。中国要实现“充分现代化”的农业，只需要1300万农民“充分现代化”的农业会让大约8亿人离开农村家园，迁居到本就人满为患、遭到污染的大城市。这一迁移会迫使中国再建80个像北京或上海那样能容纳1000万以上人口的城市。考虑到环境的承受力和人民的幸福感，这种以大城市为主调的城市化显然是不可持续的，美国的主流城市化模式正是中国所要避免的。

他认为如果中国高层领导发起关于什么是真正幸福的问题的全国性讨论，那么，这种讨论方式在中国能以一种区别于其他国家的独特方式进行，而这种独特的方式，在其他国家多半是不可能行得通的。这种讨论甚至将会有助于国家做出正确的决策，有利于实现个人的幸福。中国可能会使城乡生活实现真正的平等；中国也有可能致力于构建一批真正能够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小型化城市，并为全球的可持续发展做出榜样。

（据《文汇报》摘编，访问者王治河、李玲，2013年2月4日）

■ 张立伟：警惕“数字激进主义”

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张立伟质疑把传统媒体遭遇困境的归因为“没有抓住数字化的机遇”的观点，他认为传统媒体十几年来数字化屡战屡败的教训在警示我们，必须要认真反思传统媒体数字化进程了。

数字激进主义的特征主要为：互联网第一；新技术至上；创造性做账；踞进步高地。“互联网第一”是数字激进主义的宣言和实践，“新技术至上”是数字激进主义的源头和实质，“创造性做账”由实务界让其外表光鲜，“踞进步高地”由理论界给出合理化论证。

以保守制约数字激进主义在作者看来是必要的，以保守制约激进就是回到经验的逻辑，对未知多几分怀疑，对理论少几分不疑，始终尊重常识理性、实践检验。近几年，中国几大传统媒体都在平稳发展，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传媒人的常识理性抑制了数字激进主义。

但是单凭保守是远远不够的，在抑制激进的同时我们还需要创新，既不鲁莽冒险，又不停滞不前。这主要包括循环往复的“四步曲”：第一步：多元试错；即多方尝试，然后优胜劣汰，但这种尝试成本不要高、费时不要太长。第二步：及时扶优；母媒体要扶持网站打“游击战”，找一块细分市场，控制一个有生存资源、生存优势的适合自己的小生态环境。第三步：果断汰劣；即把投注到无效或低效领域的资源释放出来，如纸媒应撤去电子版。第四步：创造模仿；即别人走通了的，你跟着走又增加新东西。

（据《中国记者》摘编，2012年11期）

■ 曾一果：新媒体与当代恶搞文化的“社会政治”

苏州大学凤凰传媒学院教授曾一果认为，在新媒介时代，“恶搞”的现象在网络空

间里随处可见，各种各样的“搞怪”不仅为青年大众提供了消遣和娱乐，而且许多青年其实也通过“恶搞”介入社会和文化政治，发表对社会各种问题的看法，特别是原来处于社会边缘地位的青年女性，在今天的新媒体也变得异常活跃，她们在微博、博客等空间里，用语言、文字和身体“嬉笑怒骂”，努力颠覆男性的话语霸权，参与对社会政治的评论。

通过对大量“恶搞”视频和微博所包含的“政治话语”进行分析，作者认为在新媒体时代，不少网民正借助于各种手段介入到现实生活和国家政治中，表达自身和大众诉求。但是，多数的“恶搞”性文字、视频和图片介入社会的程度都不深，其反叛性和颠覆性力度不大。并且，它们没有提供一个解决社会和政治问题的有效途径，反倒让人们失去了方向，陷入了更大的文化和社会困境中。它们不断地被权力和商业收编、招安，一些“恶搞”性的图片被当成了社会和权力部门的“遮羞布”，转移了人们的视线，真正的社会和生活问题反而被悬置和搁浅。

（据中华传媒网摘编，2013 年 2 月 11 日）

5. 机构动态

■ 文化部召开 2013 年驻外文化机构负责人年会

2013 年 1 月 6 日—8 日，文化部在京召开“2013 年驻外文化处(组)及文化中心负责人年会”。文化部党组书记、部长蔡武会见了与会者，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赵少华作主旨报告。文化部外联局局长(港澳台办主任)侯湘华总结了 2012 年的全局工作，部署了 2013 年的工作重点。98 位来自驻外使(领)馆文化处(组)、中国文化中心的参赞、主任和负责人，42 位对外文化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文化部相关司局、直属单位及媒体代表参加了会议，共同回顾了十七大以来对外文化工作成绩和经验，讨论了新形势下增强对外文化工作实效、促进可持续发展的思路和举措，并就对外文化工作如何融入国家“五位一体”发展格局、促进文化强国建设做出了初步部署。

会议指出，过去五年对外文化工作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开拓创新，获得了新发展。主要体现在：一是发展理念和规划部署进一步系统和明确。二是国内外协作机制建设成效显著。三是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建设快速发展。四是品牌和贸易发展步伐加快。五是“文化中国”形象日渐生动丰满。

结合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和建设文化强国总体部署，会议提出了进一步构建和完善“对外文化工作综合体系”的新要求。一要构建思想理论体系。二要构建社会资源服务体系。三要建立综合统计评估体系。四要进一步完善队伍建设和后勤保障体系。

（据文化部对外文化联络局：《对外文化交流通讯》摘编，2013 年第 2 期）

■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举行第十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

2013 年 1 月 5 日 –6 日，2013 第十届中国文化产业新年论坛在北京大学开幕。本届论坛由北京大学联合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政府主办，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中共北京市海淀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海淀区文化发展促进中心共同承办，由北京远见聚和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特别支持。本次论坛共有四百多名来自政、产、学、研各界人士参加。

本次论坛以“文化创新战略：创意与科技”为主题，旨在探讨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文化创意与科技创新如何融合互动、如何带动中国文化产业振兴、如何助力“文化强国”梦想的实现。与会者分别围绕文化软实力与美丽中国、特色文化城市与创意驱动力、数字出版与未来阅读、文化遗产的科学保护与文化复兴、两岸文化产业案例经典、创意战略与文化影响力、文化内容跨界融合等多个焦点议题深入展开讨论交流。

（据新浪财经摘编，2013 年 1 月 7 日）

■ 深圳大学国学院举行“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研讨会

由深圳大学主办、深圳大学国学研究所承办的“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国际学术研讨会于 2013 年 1 月 19 日在深圳开幕。在为期两天的研讨会上，来自美国、俄罗斯、韩国、马来西亚等国家和中国内地、港台地区的 127 位专家学者，将就“儒家核心价值”、“儒学的现代发展”、“当代新儒家的儒学观”等问题展开讨论。本次研讨会将儒家思想与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相联系，对现实要求明确，对于中国崛起大背景下的精神文明建设具有指导意义。

（据《深圳商报》摘编，记者韩墨，2013 年 1 月 19 日）

6. 海外视野

■ 法国影视基金如何“滚雪球”

日前，法国国内出现了一场关于法国电影资助制度的激烈论争，《中国文化报》驻法国特约记者对该制度进行了详细的讲解。

法国电影资助制度缘起于二战之后，为了抵制美国电影对法国乃至欧洲的大举入侵，法国采取了“对美电影实行配额限制”“对本国电影制作进行补贴”等抵制措施，1948 年，法国成立特别基金，用以扶持电影产业的发展。这一措施后来演变成电影资助法案，其特点就是政府规定从每张电影票中征收一定比例的附加税，将所得税款全部纳入电影资助基金，直接用于电影制作。1986 年，该基金更名为影视资助基金。这一制度对于保持法国电影产业的强大竞争力起到了重要作用。

法国电影资助政策的执行部门是隶属于文化部的国家电影中心（CNC），它通过所掌管的影视基金对电影产业的各个环节给予资助和扶持。影视基金不是来自政府拨款，而

是来源于影视产业自身，通过国家电影中心的重新调配依旧回流到市场。该基金设立之初，基金来源主要依赖于从每张电影门票中提取约 11% 的特别附加税，而随着电视业和新媒体的不断发展和繁荣，原本单一的税源扩展至录像带和 DVD 销售税、网络视频点播营业税和电视营业税等多种税源。近年来，由于电视台和电视频道的增多，电视营业税在基金总额中所占比例越来越大，目前已达到 77%，成为基金的主要来源。

法国国家电影中心主要通过两种方式将资金返回给影视产业，即自动性资助和选择性资助。自动性资助是将某位制片人在电影放映时所得的门票附加税和卖出的电视播映权、录像带及 DVD 版权的税款，按照一定比例自动划入由 CNC 为其设立的个人资金账户，当电影制片人在拍摄下一部电影或偿还债务时就可以申请直接使用该账户里的资金。选择性资助大多针对导演的处女作和艺术电影，目的是鼓励新人新作和推动电影艺术的多样性，特别是通过扶持有潜质的艺术创作来培育电影市场。这种资助类似于银行贷款机制，对一部作品的资助不得超过总成本的 50%。每年，CNC 在全国范围内接受 500 多个候选剧本，由其下属的 8 个委员会审阅后从中挑出几十个，给予资金支持。获得资助的影片需用票房收益偿还资助金。但如果影片上座率不高，票房收益甚微，制片人无须偿还。

这种影视资助机制不是简单的输血型扶持，而是促使电影产业自身具备造血功能。将上缴的影视税返还给制片人的下一部作品，可激励制片人生产更多的优秀作品，争取更多的票房，为今后发展积蓄资金，由此产生“滚雪球”效应。这实际上是从制片、发行和放映三个环节帮助制片人完成自身造血过程。把电影、电视、录像、网络视频点播 4 种行业全部纳入 CNC 统筹范围，这种影视联盟形式的组合，体现了行业互惠互利的原则，构成了法国电影的独特生存环境，增强了整个影视业的抗风险能力。并且，该机制有助于培育新人、鼓励创新，而择优资助更集中体现了对艺术电影的推崇和扶持，有效地保护了法国民族电影的生存和发展空间。

（据《中国文化报》摘编，记者梁建生，2013 年 2 月 1 日）

■ 美英文化产业融资之道

英、美等国在文化产业融资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其融资渠道主要包括政府拨款、准政府组织资助、基金会资助、财团投资等，多样化的融资渠道、完善的融资体制为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了强大的支持和保障。而这对我国文化创意产业改革融资办法，放宽民间资本进入的限制，进一步加强政府在文化产业投资中的地位和作用也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英国文化产业的融资方式主要包括：拓展中小企业筹资渠道、国家彩票基金模式、“政府陪同资助”。英国创意产业从业者多为中小企业，它们自己资金紧缺，英国政府为了给那些有创新能力的个人或从业者的发展提供资金，出版了《融资一点通》，公布了《创意产业资金地图》，指导相关企业从政府部门或金融机构获得资金上的支持。同

时，提供各种各样的融资渠道，如政府拨款、准政府组织资助、基金会资助等。国家彩票基金模式是指以法规的形式将国家彩票的部分收入投资文化设施的建设，支持优秀艺术门类的发展和人才的培养。“政府陪同资助”是英国所特有的发展文化创意产业的融资模式，即如果企业决定投资某一文化创意产业，政府将陪同企业一起资助该项活动，为这项活动的质量和成功打上“双保险”。

在美国，文化产业主要采取多元化的混合资助方式，将政府支持与社会资金、产业资金相融合，政府支持主要针对公益性文化领域。美国设立了中小企业管理局，这是政府为鼓励和扶持中小企业设立的融资保证和资金支持机构，扶持对象限于年销售额在100 万美元以下，或员工小于一定数量的中小企业。中小企业管理局所提供的融资方式有两种：一是中小企业贷款保证；只要中小企业符合中小企业管理局贷款保证要求和条件，便可申请融资保证，由中小企业管理局的合作银行或其他融资机构为企业提供所需贷款。二是中小企业投资公司计划；中小企业投资公司是由中小企业管理局核准授权而成立的、介于政府和民间之间性质的非国有投资公司，目的是对小型新兴企业进行投资或融资。中小企业投资公司对中小企业的融资时间较长，通常为 7 年到 10 年，其资金主要由私人、政府以及通过由中小企业管理局担保发行的债券和参与型证券在资本市场筹集的资金三部分组成。美国文化产业所需资金只有少量来自各级政府，大部分来自私人、企业和基金会的赞助和票房盈利。美国文化产业投资主体呈现多样性的特点，并形成了政府、外来投资和融资体制三结合的机制：一方面国家直接向所有符合政策导向的团体提供扶持，另一方面吸收非文化部门和外来投资，一些大财团直接向许多有实力的文化产业巨头进行投资。

（据《中国文化报》摘编，记者橘子，2013 年 1 月 12 日）

7. 研究院之声

■ 我院《文化决策参考》文章在北京市两会期间引起反响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成立一年来，逐渐明确了自己的定位，制定了详尽的科研计划，各项研究正在有条不紊进行并得到北京市领导和社会各界的广泛好评。特别是研究院主办的内部决策咨询月刊《文化决策参考》《北京文化通讯》直接上报市委市政府和其他管理部门，有效实现了学术成果向政策建言的转化。截至目前，《文化决策参考》已连续编辑 9 期，刊登了近 20 篇文化政策领域的前沿研究成果，刊物得到刘琪、鲁炜、蔡武等北京市领导和文化部领导的批示，认为“很有参考价值”“有信息、有内容、有参考”，其中部分建议已被有关部门采纳。

在最近召开的北京市政协十二届一次会议期间，《文化决策参考》的两篇文章被民进北京市委作为建议和提案上报市委市政府。一是在《文化决策参考》(2012 年第 5 期)刊载的中国传媒大学胡智峰教授的《关于北京市电影院发展问题的观察与思考》基础上，

经过加工提炼，以“党派提案”形式，向决策层提出“加强电影院建设，打造东方电影之都”的建议；二是借助《文化决策参考》2012 年第 8 期刊载的鲁迅文学院王彬教授的《北京名人故居的困局、现状与建言》一文，结合相关研究成果，由北京民进会员中的 22 名政协会员联名向北京市政协联名提出了《关于北京名人故居保护的几点建议》。该提案立即被《北京晨报》等多家报刊、网站报道，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委员们反映，北京是著名的文化古都，在北京众多的文化遗迹中，名人故居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多年来，北京的名人故居始终处于“拆”和“保”的博弈之中，这种博弈说明在对待名人故居的观念上还存在着模糊认识，相关制度设计也有待完善。面对日益消失的名人故居，迫切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给予足够的重视，尽快行动起来，保护好这一不可再生和复制的文化资源。委员们认为，名人故居不仅有建筑价值，更承载着很高的人文与研究价值，名人故居保护应从“以人为本”的角度确定保护原则。针对如何做好名人故居的保护和开发利用，委员们也提出了多项具体建议。民进会员中的政协委员能够共同关注这一问题，得益于首都师范大学与民进北京市委共同建设的文化战略研究平台提供的有力支撑。

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是在北京市委市政府主要领导的直接关心下，由民进北京市委主委、首都师范大学校长刘新成倡议成立的，为市委市政府文化战略决策提供政策咨询。它既是一个学术研究和政策咨询机构，同时也是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重要渠道。借助文化研究院的平台，首都师范大学与民进北京市委及有关方面展开了广泛合作，共同举办了“推进全国文化中心建设研讨会”、“北京精神的文化阐释论坛”等一系列重大学术活动，有力地提升了首都师范大学与民进北京市委的学术地位与社会影响。为了更好地发挥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的智力优势，将学术研究与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相结合，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还和民进北京市委确立了“互惠互利、共建共享、优势互补、合作发展”的原则，形成了《民进北京市委—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协同工作机制建设方案》。今后，文化研究院将围绕北京建设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核心任务，与民进北京市委展开更广泛深入的合作，积极探索研究院与民主党派相互依托、协同推进首都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新模式、新途径，有效实现学术成果向政策建议、科研活动向政府决策积极的转化。

主　　办：首都师范大学文化研究院
主　　编：陶东风　邱运华
执行编辑：符　鹏

通讯地址：北京市海淀区西三环北路 83 号，100089
电子信箱：wenhuazhanlue@ gmail. com
联系电话：(010)68903449、68903576

(内部参考)